

有声思维法在翻译教学中的运用

——TAPs 翻译研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李德超 香港理工大学

在种种翻译研究的途径中,有一种方法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及特别的理论关怀而在当代翻译研究中独树一帜,并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种方法就是TAPs (think aloud protocols) 翻译过程 (translation process) 研究 (简称TAPs 翻译研究)。

1. TAPs 翻译研究的研究对象及方法

TAPs 翻译研究的研究对象为“翻译过程”。在当代译学界,此术语通常具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亦是较为常用的意义,是指翻译活动从准备到完成的顺序。例如,Rose 认为翻译过程由(1)初步分析;(2)详尽的文体和内容分析;(3)适应原文文本;(4)重组原文文本;(5)分析译文;(6)检查及比较这六部分组成(Rose, 1981:1-2); Bell 则认为翻译过程包括“分析”(analysis)和“综合”(synthesis)这两大步骤(Bell, 1991)。他们所指的“过程”即是此术语的第一种意义。“翻译过程”的第二层意义较第一种抽象,它指的是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大脑这个“黑盒”(black box)中经历的思维过程。换言之,“过程”这里用的是其在心理学上的意义,泛指大脑的思维活动。TAPs 翻译研究所用的均是此术语的第二种意义。

简单地说,TAPs 翻译研究就是让受试者用“有声思维法”(thinking aloud method)口述自己在翻译特定任务时大脑的所思所想。与此同时,研究者会用录音机或录像机将受试者在实验中表述的一切言语记录。受试者完成翻译任务后,研究者会将记录下来的录音转为可以用于进一步分析的文本数据(protocols),然后在分析这些数据的基础上,重组出受试者翻译时的一些思维模式和规律(李德超, 2004, 2005)。

2. TAPs 是否能真正反映译者的翻译过程?

TAPs 翻译研究的一个最常遭受诟病或质疑的地方就是其采用的“有声思维法”能否真正地反映受试者的思维过程。“有声思维法”最早为德国心理学家Karl Bühler和Edouard Claparede (1933, 1934)所用(Lörscher, 1991: 68)。就其本质而言,“有声思维法”其实是属于心理学中收

集思维过程数据的内省法(introspective methods)或口语报告法(verbal report procedures)中的一种。对于这种研究方法提示大脑进程的有效性,心理学界的学者有迥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脑活动纯粹是一种神经系统(包括各个神经元)的活动,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混沌的、类似直觉的运动,无法用任何方法窥得其中奥妙。持这种观点的人,正如Chesterman所评论,其最终的研究结果将会是涉及“神经学、化学和物理学,并提供一种涉及原子、神经活动等的简约论解释(reductive explanation)”(Chesterman, 2005: 19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把人类的思维过程视为是一种发生于大脑的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之中的信息处理过程,那么有声思维法是能够反映受试者的思维过程的,因为工作记忆(尤其是短期记忆)是能以口头话语(verbalization)表达和再现的(Jääskeläinen, 1998: 266-267; Ericsson and Simon, 1984)。

在翻译研究领域,有些学者赞成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大脑中发生的翻译转换行为是神经系统的瞬间的动作,无法用任何言语来表达。这种观点其实是目前翻译教学中不时听到“翻译家是生成而非教成”的“自然翻译观”(natural translation)(Harris, 1977)言论的心理语言学根源(邓静、穆雷, 2005)。笔者不赞同第一种观点,因为持该观点就意味着否定翻译教学的作用,将翻译技能的习得和提高完全归于不能把握的、虚无的心灵因素上。促使笔者反对第一种观点的因素之一是基于现代心理学对有声思维法及其与反映思维相似性的研究结果。

根据心理学家Ericsson和Simon的研究,以有声思维法获得的受试者的数据与其思维过程可能存在以下三种对应情况(1984: 78-107; 亦见李德超, 2004):

(1) 如果受试者执行的是需通过一系列步骤才能达成的口头任务,那么TAPs数据就与大脑内的思维过程有很高的对应性;

(2) 如果受试者执行任务时大脑经历的是一种高度的自动化过程,且这种过程的中间阶段并没有储存在受试者的短期记忆中,那么,这种

思维过程就几乎不能产生出相关的 TAPs 数据;

(3) 如果受试者执行任务时大脑经历的是一种非自动化的思维过程,且执行时依靠的是视觉编码信息,而非口述信息,那么,针对这种思维过程所获得的 TAPs 数据是不完整的,这些数据与受试者的思维过程仅存在着部分对应的关系。

就人类大脑里发生的翻译过程而言,虽然有可能在翻译句子层(sentence level)以下的单位(如前缀、后缀、词素、单词、短语),甚至包括简单的、尤其是只具有寒暄功能(phatic function)的句子(如How do you do? How are you?等)时,可能会出现上述的第二种情况,即翻译过程由于高度自动化而无法从 TAPs 数据中得到体现。但绝大部分句子层或句子层以上语言单位(如句群、段落或篇章)的翻译过程均是需要在脑中经过一系列分析和重组步骤^①才能达成的。简单如Eugene Nida所说的“Translation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这句话,一位有经验的译者在翻译时并非不假思索地、机械地按照大脑中浮现的字典中的对应语的解释而将其自动对译为“翻译是翻译意思”。通常,除了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外,他还会注意到这个句子结构上的特点,即在这简短的由四个词组成的句子里,单词的运用和排列有其特点,即“translation”与“translating”均为同一个动词“translate”的派生形式(derivative),而“means”及“meaning”亦为同一动词“mean”的派生形式。这四个词按照ABAB的形式排列成句,组成了一种特殊的回环、双关(wordplay)的修辞效果。除了格式上的特点之外,译者还会注意到这个句子在声音上的特点:这个句子在声音上错落有致,其重音及轻音的形式都按照特定的格式排列,朗读时有很强的节奏感。如果我们用诗歌中常用的轻重音符号,即“v”来表示轻音,“/”来表示重音,用“|”来划分句子中最小的节奏单位(即“音步”,metrical foot),则上述句子的节奏可以划分为| v v v v |的形式。而这正是英语诗歌中常用的抑扬格五音步(iambic pentameter)的格律形式^②。注意到原文在形式和声音上的特点后,译者这时就会不满足于只翻译出原文的语义,还会设想如何在译文中再现这些文体效果。鉴于“translating”可译成“翻译”,而“meaning”可译成“意义”、“意思”等,他可能会尝试以这些词为中心,进行多种排列和搭配,以得出音、形、义最佳结合的译文。顺着这个思路,他可能得出的译文会有(当然还可以有许多其它可能性):

- 1) 翻译的意义在于翻译意义。
- 2) 翻译的意思就是翻译意思。
- 3) 翻译即翻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在大脑中进行的翻译步骤都是紧密相联,一环扣一环,并有明

确的目标,译者则是清晰地向这个目标迈进。这充分表明,翻译并非是一种机械的语码转换,译者在翻译时的思维过程并不是全靠直觉,其思维过程亦并非是混沌一片不可分析。翻译这项活动其实是译者通过一系列的步骤才能达成的任务。这也正是Ericsson和Simon所说的第一种情况。由于这些步骤均储存于译者的短时记忆之中,因此译者完全有可能用有声思维法来反映其思维过程。换言之,一个译者的TAPs数据与其大脑思维过程有很高的对应性,它们是能够揭示发生于大脑中的翻译进程的过程和特点的。

3. TAPs 翻译研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源自心理学研究中的有声思维法尚未为语言研究者所熟知,因此,尽管有不少学者对译者翻译时的思维进程倍感兴趣,但苦于研究手段的缺乏,均只能对此神秘的领域望而却步。早在1957年,英国著名语言学家Firth就曾经感叹到:“译者虽然能穿越不同语言屏障,但却连自己都不明白到底是通过哪些桥梁穿越的”(1957: 27)。即便到了1975年,即Firth发表上述言论18年后,Steiner仍然只能感慨在翻译中我们至今仍然不明白脑海里有哪些“原则、机制和程序”来促使或指示译者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1975: 273)。

直至1982年,德国学者Ursula Sandrock率先采用TAPs方法来研究翻译过程。据Jääskeläinen统计,随后20年间,国外共发表了108篇/本有关这方面的论著(2002:135),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探讨与翻译有关的外部因素,如字典、翻译述要等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二是研究译者的内部情感因素,如动机、兴趣等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三是描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涉及的具体的翻译行为,如采用的翻译策略、翻译单位等(李德超,2005)。

从上面简介中可以看出,TAPs翻译研究除了帮助我们多维度认识翻译的本质外,它另一个非常直接、明显的作用就是对翻译教学的指导和帮助。这其实也正是TAPs翻译研究的初衷之一(House et al, 1986; Færch, 1987)。例如,我们可以选取特定的角度,比较专业译员与翻译学生在翻译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不同特点,进而总结出一些对翻译教学有普遍意义的模式或规律;我们亦可以比较成功的学生与较不成功学生在做同一翻译任务时所呈现出来的思维特点及其能力倾向,进而在翻译培训中有的放矢地培养学生。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将TAPs方法作为一种查找和分析学生翻译错误根源的工具。比如,教师可以给学指派特定的翻译任务,然后根据收集到的TAPs数据来分析学生的翻译方法、翻译策略上存在的特点和不足,然后提出改进意见,从而提高学生整体的翻译水

平 (Wakabayashi, 2003)。

就翻译培训而言, TAPs 翻译研究的可取之处在于其独特的研究思路: 它不是采取翻译教学中常见的先理论后练习的理论推演法 (theoretically-deductive), 而是采用先归纳学生思维过程中可观察到的翻译活动的特点, 然后再提升到理论的经验归纳法 (empirically-inductive) (House, 2000: 152)。相比较而言, 前者是采取一种规定性 (prescriptive) 立场, 事先定好教学目标及学生需掌握的要点, 但有时可能会过于理想化, 或是脱离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要; 而后者则是采用描写性 (descriptive) 立场, 其结论均是源自对学生可观察的翻译认知过程和特点的总结, 这更符合学生获得翻译能力 (translation competence) 的认知过程, 也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确实需要。

但纵观目前运用 TAPs 这种实证性方法来研究翻译教学的成果, 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绝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是以学生 (包括翻译专业和非翻译专业) 或是专业译员为研究对象, 其研究结果的适用性均是对学生而言。而对于教师在翻译课堂上教学的 TAPs 研究则几乎没有。

当然, 这种缺乏可能与 TAPs 方法的诊断性 (diagnostic) 本质有关。我们知道, 诊断性 (diagnostic) 方法特别适合于查找问题和解决的问题, 而对于以解决学生在翻译上遇到困难, 最终以提高学生翻译水平为目标的翻译教学而言, 显然是再合适不过了。目前大量的 TAPs 翻译研究从多方面揭示了一名翻译学生如要成为优秀的译员, 应当具备的一些品质和应当努力发展和习得的技能和方法。但从学生的角度来看, 如果一名翻译教师能够在课堂上现场展示其在翻译特定的原文时, 思维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这无疑比许多干巴巴的要求、理论或注意事项显得更为直观, 更为有效, 也更为有趣。通过多年的研究,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只要经过基本的培训, 教师是完全可能将自己翻译时大脑内的思维过程用言语表达出来的, 且正如本文第 2 节所述, 这些口头复述的数据与译者大脑中的进程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的。因此, 笔者在此建议, 在翻译教学中, 教师可以用有声思维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方式。如运用得当, 这种方法将给传统的翻译教学注入一种新的教学思维模式, 促使翻译教学变得更有效率。

4. 翻译教学中的有声思维教学: 一种新的翻译教学尝试

具体而言, 在翻译教学中采用有声思维方法指的就是要求翻译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直接将自己在解决一项翻译任务时大脑里的思维过程通过有声思维的方法一步一步地用语言表达出来。思维过程这里包括在翻译过程中所有浮现

在教师大脑中的想法和考虑。这些想法有些可能会比较概括, 包括诸如翻译目的、译文的读者、译文的整体策略和翻译委托者的具体要求等等; 而有些则可能会比较具体, 例如具体的选词、分析原文的每一个步骤、解决翻译中浮现的一些细节问题 (local problems) 和组织译文时考虑到的因素等等。只要是教师翻译时的出现的想法, 事无巨细, 均要求如实地说出。

为了让教师的示范翻译过程更接近学生在实际环境中遇到的翻译情境, 运用这种方法时, 所选的翻译任务最好是教师未曾翻译或准备过的内容, 或是采取学生在课堂上即时提出的翻译任务 (教师事先并不知情), 目的是要最真实地反映教师平常的翻译思维过程。由于教师在翻译过程中是一边思考一边用口头讲出, 所以与有备课的讲述相比, 这些口头报告内容可能会出现较不系统、次序凌乱甚至不合逻辑的情况, 在这点上翻译教师的有声思维教学与文学作品中为表现人物无意识想法而常用的“意识流”手法有些类似, 因为两者都是采用一种非线性的叙事结构。但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想法有最终的目的, 因而是一种有计划、有步骤的行为, 而后者往往是一种无任何目的, 正如 James Joyce 的小说 *Ulysses* 中的主人公 Harold Bloom 的“胡思乱想”。

教师在课堂上运用有声思维进行翻译过程示范时, 应鼓励学生就教师所述的内容随时提出自己的问题、想法或提出与教师迥然不同的译文。而教师则应即时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和解释, 并同样用有声思维法将自己解答的思路讲述出来。TAPs 翻译研究的成果早已证明, 实验中如果以多位受试者共同以一问一答的形式 (即所谓的“协同翻译”, joint translating) 导出 TAPs 数据往往比以个人自言自语而得到 TAPs 数据更完整, 亦“更为真实” (House, 1988: 95)。

下面为笔者一次在课堂上利用有声思维法教学的片断。囿于篇幅, 以下所提供的 TAPs 数据经过事后的编辑和简化, 删去了一些表达语气的感叹词和无实在意义的补白语言 (speech fillers, 如“哦”、“是啊”、“是这样的”等等), 但读者仍然可从中窥得利用有声思维法教学的基本操作方法。

先介绍一下与此次教学相关的信息。这次有声思维法教学发生于笔者教授的一门名为“翻译理论运用”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的课上。这门课的目的主要是加深学生对翻译理论的了解 (学生学习这门课之前均先修了“翻译理论介绍”这门课), 帮助学生将所学的理论有机地结合于实际的翻译情境之中, 做到用理论来解释翻译现象或指导翻译实践。这门课每星期上一次, 每次上两个小时, 对象是香港某大学翻译专业三年级的毕业生 (香港所有大学的本科学制均为三年)。每班学生约 25 人。因为

这门课强调的是学生对理论的“运用”，所以学生的参与在课堂教学中占很大的比重。通常，课堂的第一节为学生汇报时间，第二节才由教师专程讲解他认为有价值的翻译专题。

教师会事先将学生分为三至五人的一个小组，然后每次上课时，由不同的小组向全班同学汇报他们是如何将理论运用于具体翻译情境的个案研究(case study)，每次报告(presentation)历时为30分钟。汇报完后有10分钟给充当听众的其他学生提问，然后教师利用5至10分钟的时间对上述的汇报和讨论作点评。这次有声思维法教学是发生在教师点评的环节。当时学生选取的题目是运用语用学的理论来分析Jane Austen小说《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中男人主人公达西(Darcy)和女主人公伊丽莎白(Elizabeth)的几处对话的翻译。以下讨论的这节对话的背景是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但由于后者误会达西使用卑鄙手段来阻止其姐与达西的好友宾利先生(Mr. Bingley)的恋情，因而措词激烈地断然拒绝了达西的求婚，并且还质询达西是否真有其事。这是书中的一个上升情节(rising action)，为以后全书高潮的到来起了铺垫作用。原文以及内地和香港的三个译本对此段的译文引用如下：

ST:

“Can you deny that you have done it?” she repeated.

With assumed tranquility he then replied: “I have no wish of denying that I did everything in my power to separate my friend from your sister, or that I rejoice in my success. Towards HIM I have been kinder than towards myself.” (Austen, 1975:157)

TT:

(1) “你敢说你没干吗？”伊丽莎白又问了一遍。

达西故作镇定的答道：“我不想否认，我的确竭尽全力拆散了我的朋友和你姐的姻缘，并且还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高兴。我对宾利比对自己还要关心。”(南京译林版)

(2) “你能否认你这样做过吗？”她又问了一遍。

他故作镇静地回答道：“我不想否认。我的确用尽了一切办法，拆散了我朋友和你姐姐的一段姻缘；我也不否认，我对自己那一次的成绩觉得很满意。我对他总算比我自己多尽了一分力。”(上海译文版)

(3) “你能否认曾做过这件事？”她重复说着。

他平静地答道：“我不愿否认我曾竭力拆散我的朋友与令姐一事，我深庆我的成功，我之爱护他，更甚于爱我自己。”(香港文海版)

学生在讨论以上三种译文时，意见分歧，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对伊丽莎白的发问“Can you deny that you have done it?” she repeated.的翻译上。他们觉得三个译文里，译文(2)和译文(3)行

文较拗口，在日常对话里很少有人会用这两种表达方式。译文(1)虽然较佳，但好象又欠缺了什么。让学生尝试提供一个自认为比以上三个版本更好的译文，学生思索一阵，仍然苦无良策。他们继而想听听如果是由笔者亲自翻译的话，将会译出怎样的版本，并指出以上三个译本的第一句翻译有何不足之处。虽说在每节课学生所作个案研究之前，他们均会将提纲交予给教师审阅，但教师并不熟悉学生引用的每个例子的原文和译文。因此，当学生突然提出这个任务时，教师是无事先准备的，但正因如此才更能反映教师在翻译时真实的思维过程。

为了让学生能够直观地了解到教师翻译时的思考过程，区分作为有经验翻译者的老师与学生在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上的一些区别，我在翻译此句时运用了有声思维的方法。首先，笔者指出，从体裁来看，《傲慢与偏见》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根据Reiss的观点，文学作品具有的独特的“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Reiss, 2000)，如果要在译文中完整地保存原文的这种功能，从整体翻译策略上来说，我们应该运用Newmark所提倡的“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方法，即要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保持原文的内容和形式，因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艺术效果(Newmark, 1981)。

其次，原文中出现一句表明说话者身份及动作的修饰问句(tag question)“She repeated”。从语境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指伊丽莎白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而非重复先前说过的句子，所以我们不能象译文(3)那样译成“她重复说着”，因为伊丽莎白根本就没有重复前一句话，这样会造成这段对话在语义上的不连贯，因此我们可以改译成“她又问道”或类似的表达法。另外，从对话的内容来看，当时双方都互不信任，且情绪都较为激动(学生事先已经了解这部分情节)。可以想象，他们之间的对话的音量应该都比较大，绝非是心平气和的那种闲谈。虽然说音量的大小、音调的高低这种副语言学特质(paralinguistic)主要反映在口语中，但它在书面语中同样可以通过超音段(supersegmental)的方法，如斜体、粗体或大写等印刷手段表现。例如在原文达西的回答里，我们注意到，“HIM”这个词全部用了大写，这就充分表明这个词的语气是特别加强的。这些声音上的特质我们应当在译文中尽量复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译文(2)才注意到了原文的这个超音段特征。

再次，从Austin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s)的角度来看(Austin, 1962)，分析对话可以从以言指事(locutionary act)、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和以言成事(perlocutionary act)，这三个角度进行。从表面上看，伊丽莎白的这句话“Can you deny that you have done it?”是一个问句，好像要询问对方

以获取更多的信息,也即以言指事效果。但事实上,这句话的真正潜在意义,是逼迫对方承认做过这件事,且承认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即以言行事效果)。她的语气不是一种讨论或询问的语气,而是一种指责、批评的语气。而从下句来看,我们发现达西痛快地承认了伊丽莎白的指责,换言之,也就是达西意识到了伊丽莎白这句话的潜外之意,而伊丽莎白这句话的以言成事效果也得到完成。从这个角度看来,译文(2)与(3)显然就没有注意到伊丽莎白这句话的语用效果,“你能否认你这样做过吗?”和“你能否认曾做过这件事?”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普通的问句,语气平淡,相当于在提问题,而没有充分反映伊丽莎白谴责的口吻。译文(1)“你敢说你没干吗?”很明显地看出译者认识到了原文的以言成事功能,因而语用效果较佳,但语气可以再加强。

最后,从译文句子的结构来看,译文(2)和(3)都是典型的书面语,句子较长,在真实的语境中,尤其是在说话人处于情绪激动的时候,显然不会用长句子来指责对方。相反,说话者会倾向于用短句,因为这样说话节奏快,效果明显,亦符合中文意合(paratactic)的语言结构特点。同样,中文在责骂人的时候,往往是列举当事人所作的事实在先(原因),然后再对其行为作出个人评论,这是由中文表达因果关系的习惯所决定的。因此,译文(2)与(3)同样以“你能否认……?”来开始,显得太拘泥于原文句式,反而不合中文习惯。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译成“你做过这件事,难道还想否认?”这样,原文中伊丽莎白谴责的口吻就得到了保留。如果觉得还可以进一步加强语气,我们还可以译成“你明明做过这件事,难道还想否认?”等等。

这时,有学生提出可不可以用“抵赖”来代替“否认”?因为前者比后者更为口语化,且音响效果更佳,并且“抵赖”与原文的“deny”有一种额外的音似效果。笔者接受学生意见,将原句最终译为“你明明做过这件事,难道还想抵赖?”联系到本次个案研究的主题,笔者向学生指出在译文中如实地保留原文的语用效果是文学翻译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然后,笔者向学生提出一个堂上任务,即,将达西的回答译成中文,注意在译文中保持原文的语用效果。由于有了教师先前的示范和分析,这次学生不用多久就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改进译文,以下是几个版本:

学生译文1:“我根本就不想抵赖。我就是想方设法拆散我朋友和你姐的好事,大功告成后,我高兴极了。对于我的朋友,我可算是仁至义尽了。”

学生译文2:“没错,我就是要尽可能地破坏我朋友和你姐的姻缘。他们没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对于这位朋友,我花在他身上的心机比自己多多了!”

相比较已出版的译文,以上学生的译文更加充分地表现了达西受伊丽莎白的误解而备感委屈、愤懑的语气和神情,虽然部分措辞稍有过分之嫌,但无论如何,老师通过有声思维对自己翻译过程的剖白,使学生在翻译时注重原文和译文语用效果对等的意识得到了加强。

5. 有声思维翻译教学的优点及注意事项

从以上运用有声思维于翻译教学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教师利用有声思维,将自己大脑中进行的翻译过程展示给学生,这种教学方法具有很明显的优点。

首先,这种方法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的直观性和直接指导性。传统翻译教学中,教师通常只是给予学生一些事先准备好的原文,然后让学生练习。接着教师会给学生出示他所认可的范译供学生比较和模仿。但这些所谓的范译是如何得出的?范译好在哪里?除了范译之外就没有其它可能的译法吗?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在翻译教学中都鲜有谈及。同时,由于缺少向学生描述如何得出范译的具体翻译过程,这些译文的指导性也比较有限,往往只能局限于个别的例子,学生不能从这些例子中获得一些可以运用到类似翻译实践之中的可推广的经验(generalizable experience)。而运用有声思维方法来进行翻译教学则恰好能弥补以上不足。

其次,在有声思维翻译教学中,由于学生被允许随时插入或打断教师的有声思维过程,发表自己对分析过程的意见或对教师译文看法,这有利于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教师在教学中除了充当教授知识的“教员”(instructor)的角色之外,还充当一系列其它角色,如“问题解决者”(problem solver),“引导者”(guide),“咨询者”(counsellor)以及“评估者”(evaluator)等等。随着教师角色的转变和多元化,传统的“接受型”(receptive)的课堂教学模式亦相应地转变为“互动式”(interactive)的翻译教学新模式。而建立“互动式”、“建设性”(constructive)的翻译教学亦正是当今翻译界所追求的目标(Kiraly, 2003)。

运用有声思维教学法时,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我们亦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有声思维教学法要求老师要具有较强的运用理论分析翻译过程的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联系理论来解释、说明自己的每一步翻译决策。理论不仅包括翻译理论,还应包括语言学、交际学、文体学、文学等等与翻译有关的理论。这样才能让学生觉得教师的每一个步骤并不是一时冲动或全靠灵感的产物,而是经过严密的思考和分析的过程,且是在理论指导下联系实际的结果。

二是运用有声思维法教学时,所选的翻译例

子应该少而精。少是指句子不要太长，一句或两句足矣，例子太长的话，有声思维的用时也将会过长，学生注意力反而易分散；精是指所选的例子要具有代表性，学生听了句子翻译过程后，能做到举一反三。教师在有声思维时，还要注意讲述过程中要紧扣主题，有目的。虽说翻译时译者的思维可能会天马行空，但教师还是要注意不要离题太远，否则就会有浪费宝贵课堂时间之嫌。

三是要灵活运用有声思维法教学。这种手法可以在传统翻译讲授后给学生示范练习时运用，亦可以全堂翻译课都用此法教学。教师在用此法示范对特定句子的翻译之前，最好给时间让学生自己亦译同样的句子，这样学生才会有更深的体会。

* 朱志瑜教授、穆雷教授和陈霄博士曾对本文初稿提出过宝贵意见，特此鸣谢。

注 释

- ① 如对原文进行多个层面的分析，而在建构译文时又要注意一系列来自目的语的限制条件(constraints)，这些限制条件可能是语言上的、文化上的或是文学上的等等。
- ② 诗歌格律分析中，一般认为抑扬格五音步的默认形式应为' ' ' ' ' ' ' '，共包括十个音节(Corn, 1997: 44)。但有时诗人为了避免因为整句全由抑扬格组成而产生单调的声音效果，会刻意变换一个或二个音步的轻重音排列模式(sound pattern)，或是增加或减少一个轻音或重音，人为地造成一种格律上的变化(metrical variation)，以增强句子的节奏感和音乐美。所以Nida的句子尽管比默认的抑扬格五音步少一重音，这并不阻碍它成为一个具有抑扬格五音步节奏的句子。如果按照英语诗歌分析中的术语来描述Nida句中的格律，我们可以将它称之为是尾音节缺失的抑扬格五音步(final truncation or catalexis)(see Corn, 1997: 48)。

参 考 文 献

- [1] 邓静、穆雷，《象牙塔的逾越：重思翻译教学》介绍[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 (4)。
- [2] 李德超，论TAPs翻译研究的前景与局限[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 (5)。
- [3] 李德超，TAPs翻译过程研究20年：回顾与展望[J]. 中国翻译，2005 (1)。
- [4] 孙致礼译。傲慢与偏见[Z].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0。
- [5] 王科一译。傲慢与偏见[Z].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 [6] 张志成译。傲慢与偏见[Z]. 香港文海出版社，1984。
- [7] Austen, Jane. 1975. *Pride and Prejudic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8]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9] Bell, Roger. 1991.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M].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 [10] Chesterman, Andrew. 2005. Causality in Translator Training [A]. Martha Tennent (ed.) *Training for the New Millennium: Pedagogies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11] Corn, Alfred. 1997. *The Poem's Heartbeat: A Manual of Prosody* [M]. Brownsville: Story Line Press.
- [12] Ericsson, K. Anders & Herbert A. Simon. 1984. *Protocol Analysis: Verbal Reports as Data* [M]. Cambridge: The MIT

- Press.
- [13] Ericsson, K. Anders & Herbert A. Simon. 1980. Verbal Reports as Data [J]. *Psychological Review*, 87: 215-251.
- [14] Færch, Claus & Gabriele Kasper (eds.) 1987. *Introspection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C]. Clevedon &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15] Firth, J. R. 1968. A Synopsis of Linguistic Theory 1930-1955 [A]. F.R. Palmer (ed.) *Selected Papers of J. R. Firth 1952-59* [C]. London and Harlow: Longman.
- [16] Fraser, Janet. 1996. Mapp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J]. *Meta*, 1: 84-96.
- [17] Harris, B. 1977. The importance of natural translation [J]. *Working Papers on Bilingualism*, 12: 96-114.
- [18] House, Juliane and Shoshana Blum-Kulka (eds.) 1986.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C]. Tübingen: Gunter Narr.
- [19] House, Juliane. 2000. Consciousness and the Strategic Use of Aids in Translation[A]. Sonja Tirkkonen-Condit and Riitta Jääskeläinen (eds.) *Tapping and Mapping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Outlooks on Empirical Research* [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20] House, Juliane. 1988. Talking to Oneself or Thinking with Others?: On Using Different Thinking Aloud Methods in Translation [J]. *Fremdsprachen lehren und lernen*, 17: 84-98.
- [21] Jääskeläinen, Riitta. 2002.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ies into Translatio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J]. *Target*, 1: 107-136.
- [22] Jääskeläinen, Riitta. 1998. Think-aloud Protocols [A]. Mona Baker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23] Kiraly, Donald C. 2003. From instruction to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A passing fad or the promise of a paradigm shift in translator education? [A]. in Baer, Brian James & Geoffrey S. Koby (eds.). *Beyond the Ivory Tower: Rethinking translation pedagogy*[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24] Levý, J. 2000. '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 in L. Venuti (ed.).
- [25] Lörcher, Wolfgang. 1991. *Translation Performanc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 Psych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M]. Tübingen: Gunter Narr.
- [26] Newmark, Peter. 1981.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Hemel Hempstead: Prentice Hall.
- [27] Reiss, Katharina. 2000.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 Limitations* [M]. Manchester: St. Jerome.
- [28] Rose, Marilyn Gaddis. 1981. *Translation Spectrum: Essays in Theory and Practice*[C].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29] Snell-Hornby, Mary, Pöchhacker Franz & Klaus Kaindall (eds.). 1994.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30] Steiner, George. 1975.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1] Venuti, Lawrence (ed.) 2000.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Routledge.
- [32] Wakabayashi, Judy. 2003. Think-aloud as a pedagogical tool [A]. Baer, Brian James & Geoffrey S. Koby (eds.). *Beyond the Ivory Tower: Rethinking translation pedagogy*[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作者简介]李德超，博士，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研究

[作者电子信箱]lgzldc@hotmail.com

approach, as Nida would later recommend. Instead, in turning the Confucian terminology to his own use and bringing about a fusion of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he employed a strategy of translation that could only be described as “foreignizing” in today’s terms. The adeptness with which Ricci applied the foreignizing method is rarely seen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rategy; Matteo Ricci; Christianity; terminology; *Bible* translation

Thinking Aloud as a Useful Tool in Translator Training

by Li Dechao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p.34

Abstract: TAPs translation research is the application of think-aloud method to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translator's mental process, and over the past 20 years, it has been using students primarily for its subjects. The present paper argues that the think-aloud method can not only be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students' translation process, it can also be adopted in translator training to give students more direct and concrete guidance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us to establish a new "interactive" mode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in class.

Key words: think-aloud method; translation teaching; translation studies

What Chinese Versions of *Hamlet* Tell Us about Translating Puns in Literary Texts

by Zhou Y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ce Technology, China)p.43

Abstract: Many translation scholars are convinced that pun is untranslatable, which has prevented them from deepening their study of pun translation. This essay calls the belief into question by comparing multiple Chinese versions of Shakespeare's *Hamlet*. The comparison not only establishes the feasibility of pun translation, but throws light on the basic strategies to adopt for the operation.

Key words: *Hamlet*; pun; hinge; literary translation; coherence



《中国翻译》订阅、邮购信息

《中国翻译》为双月刊（单月15号出版），国际大16开本，96页。2009年定价：10元/期，全年订价60元。

订阅方式：国内外公开发售，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内邮发代号：2-471，国外邮发代号：BN272。

错过征订本刊的读者可通过本刊发行部邮购：

2009年定价：10元/期，每册邮资2元，全年72元；如需挂号邮寄，请每期另支付挂号费3元，全年90元。

本刊现库存有以下年份的散本、合订本期刊：

2008年1—4、6期，含挂号邮资共计65元，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共计15元。

2007年《中国翻译》全年精装合订本，每册含挂号邮资共计90元；

2005 年、2006 年《中国翻译》全年精装合订本，每册含挂号邮资共计 82 元；

2007 年 1—6 (10.00 元/册) 期含挂号邮资共计 75 元,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 15 元;

2006 年 1、3、4、5 (8.60 元/册) 期含挂号邮资共计 49.4 元,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 13.6 元;

2005 年 1、3、4、5、6 (8.60 元/册) 期含挂号邮资共计 58 元,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 13.6 元;

2004 年 1、2、4、5、6 (8.60 元/册) 期含挂号邮资共计 58 元,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 13.6 元;

2003 年 2、3、4、5、6 (8.60 元/册) 期含挂号邮资共计 58 元,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 13.6 元,

2002 年 1、2、4、5、6 (8.60 元/册) 期含挂号邮资共计 58 元,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 13.6 元。

2001 年 1、2、3、4、5、6 (5.50 元/册) 期含挂号邮资共计 48 元,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 10.5 元;

2000 年 1、3、4、5、6 (5.50 元/册) 期含挂号邮资共计 40.5 元,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 10.5 元。

1997年：第5期（4.50元/册），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9.5元；1996年：第2期（3.80元/册），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8.8元；

1994 年; 第 5 期 (2.35 元/册),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 7.35 元。

《名作精译——〈中国翻译〉英译汉选萃》含挂号邮资共计 26 元

读者可通过邮局汇款或银行汇款邮购以上刊物和图书:

邮购地址：北京阜外百万庄大街24号《中国翻译》编辑部，邮编：100037

银行汇款：户名：中国翻译协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百万庄支行 帐号：0200001409089010159

* 请在邮局汇款单、银行汇款单上写清您的地址、邮政编码,并在附言处注明刊名、刊期和份数

咨询电话: (010) 68995951; 68995956; 68327209, 电子信箱: taccn2008zhqfybjb@gmail.com